

# 各界共同承擔 推動醫療改革

吳珊 阿斯利康中國香港及澳門總經理

政府公布公營醫療服務收費改革方案。醫務衛生局發言人表示，預計明年實施改動後，政府資助率將由現時大約97%降至94%，預計2028年和2030年再檢討成效，探討是否需要再作調整，目標2030年再降至90%；又指相信新收費將改變市民使用服務的模式，但難以預計對使用人次的具體影響。

確保公共財政可持續性是香港發展的重點，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公立醫院收費改革不會削減政府在醫療的投放。昨日盧寵茂強調，政府的承擔並無改變，相關收入同樣會投入到醫療範疇，重申改革是希望做到能者共付及輕症共付，以幫助更多「貧、急、重、危」疾病的病人。政府優化公共醫療資源分配，將有限資源用於最有需要的弱勢人士身上，更好地保障基層市民健康，促進社會公平共融，此次改革方向正確，值得支持。

較早前公布的財政預算案提到，醫管局將制訂遺傳及罕見病目錄，並發展精準醫療，重視中風、癌症等嚴重長期病患，考慮將更多創新藥物加入資助藥物安全網。

為改善公共財政，善用資源，政府有必要以「用者自付、能者多付」的原則，更有效地運用醫療資源，妥善照顧有需要的市民。醫務衛生局推動公營醫療服務收費改革，採取醫療費用共付模式，在醫療改革邁出重要一步。未來，當局應繼續促進醫療、醫藥、醫保「三醫聯動」，優化自願醫保計劃，鼓勵多方共同承擔醫療開支，增強公營醫療服務可持續性。

政府宜提高自願醫保的扣稅上限，提升社會參與度。考慮到每年約有2萬名65歲以上長者確診癌症的情況，政府可考慮提高高齡人士投購自願醫保的扣稅上限，以加強對此高風險群組的醫療保障支援，同時鼓勵子女為父母投保，不僅能夠強化家庭互助精神，更能實現社會共同承擔的理念。

與此同時，現時自願醫保對於非手術的治療藥物保障範圍不夠明確具體，藥物承保範圍缺乏明確標準及規範，限制了受保人使用創新療法及新型藥物的機會。

因此，政府須釐清自願醫保藥物報銷範圍及擴大保障範圍，為病患提供更全面及更具透明度的治療方案，讓手術與標靶治療及生物製劑治療配合，提升治療效果，可以鼓勵更多市民使用自願醫保的保障方案。

相信政府、企業、市民攜手合作，共同承擔，可推動香港醫療深化改革，築構更大更密的安安全網，亦為香港建設成為國際醫療創新樞紐注入持續動力。

# 有安全才有發展 持之以恆維護國安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去年3月23日，《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正式刊憲，標誌着香港在回歸祖國27年後，完成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規定的憲制責任，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得以健全。民建聯以近一年時間撰寫《23演義》一書，記錄整個迂迴曲折的立法過程，梳理因此而引發的社會爭議、政治博弈與民意轉變，希望令社會對「有安全才有發展」的理念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各項數據亦充分證明了這一理念，過去一年，香港的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不僅未因立法而受到影響，更在主要領域有所提升。

## 聚焦改善經濟民生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生效一年後，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各類國際機構的認證。菲沙研究所發布的《世界經濟自由度2024年度報告》中，香港再度獲得165個經濟體中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報告亦指出，香港在「國際貿易自由」及「監管」位列首位，充分反映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另一份聚焦金融的國際報告《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則顯示香港在金融方面的競爭力維持全球第三位，在亞太區繼續居首。

與此同時，亦有更多的外商對香港的營商環境投下「信任票」。年初香港美國商會公布新一份年度營商情緒調查報告，有七成會員企業表示，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並未對企業營運造成不利影響，更有83%的會員企業對香港法治有信心，較2024年及2023年分別增加4個及10個百分點。

更為重要的是，完成《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工作，令香港社會凝聚更大共識，聚焦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立法後行政立法等治理體系的運轉、互動更加暢順。過去一年，香港更加積極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機遇，圍繞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三中心一高地」的目標，部署了許多具體工作。例如在新能源領域，特區政府公布了《香港氫能發展策略》《綠色船用燃料加注行動綱領》；文旅方面，香港亦圍繞熊貓經濟、盛事經濟，開發新IP、舉辦有國際影響力的文體活動，為文旅產業注入新動力；民生方面，在社會各界的支持下，特區政府亦拿出銳意進取的工作作風，加強打擊公屋窗戶，並着手以立法方式改善劏房條件，務求令更多基層市民安居樂業。這些聚焦經濟及民生的新舉措得以順利推行，都反映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為香港提供了更加穩固的政治基礎與環境。

## 未雨綢繆方能應對風險

雖然過去一年香港的發展成績喜人，但社會仍不能因此鬆懈，要汲取2019年修例風波的教訓，時刻防範反中亂港勢力破壞社會安寧的圖謀。香港應意識到，經濟與安全絕非二元對立的零和關係，而是起到互相促進作用的一體兩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唯有維護好國家安全、主權和發展利益，香港的獨特優勢和發展潛能才能得以進一步保證。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工作不僅要持之以恆地進行，更須主動預判。近期在立法會審議通過的《保護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條例草案》，便是這一理念的具體體現。

世界局勢風雲變幻，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未來不可避免地將遭遇更多挑戰和風險。不論是過去20餘年圍繞立法工作所遭遇的種種波折，還是立法後所展現的積極情況，無一不在提醒香港社會，維護好國家安全是香港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相信在更高水平的安全保障下，香港定能更好發揮「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的獨特作用，迎來發展的新篇章。

# 突破關鍵挑戰 打造跨境基建範例

港深西部鐵路(洪水橋至前海段)已完成次階段研究，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表示，會增設深圳灣站，藉此提升香港西部的跨境連接性，並於下半年邀請各鐵路公司提交意向書。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框架下的重點跨境基建，港深西部鐵路項目自提出以來，它存在的一系列關鍵挑戰引起社會廣泛討論，當中以跨境協同機制和項目建設時序兩個問題最受大眾關注。港深西部鐵路作為國家「十五五」規劃發展階段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進入第二個五年關鍵節點的重大項目，有必要在制度創新與效益提升加以着力，從而把該項目打造成具有中國特色、灣區特色的區域治理範例。

紀緯紋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

## 促機制對接 互認施工標準

另一方面，混凝土、鋼筋等建築材料和相應的施工程序，以及如供電制式乃至簡單如插頭等方面，兩地標準也存在分別，但不代表誰優誰劣，亦沒有統一規格的迫切性。處理方式可以制定各類建築材料的等效對照表、等效替代清單和兼容清單等，在允許兩地規格並存的情況下，一方面要求供應商提供獲得兩地認證的建築材料，另一方面在驗收時同步承認兩地實驗室報告。這方面可參考歐盟國家和美加等地跨境基建的案列。

修訂相應法例和條例是上述工作的重要支撐。一是解決涉及屬地管轄的法例和條例無法跨境執行的問題，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公共財政條例》《香港鐵路條例》等。兩地可參考紐約—新澤西港務局等國際跨境協同的成功經驗，建議一方面由中央政府授權成立「港深跨境基建管理局」，賦予該局跨境行政協調權，以港深西部鐵路作為試點，對跨境基建項目施行特殊安排；另一方面制定《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基建條例》，明確「共同規劃、聯合審批、屬地管轄」原則。二是完善各項標準的對接和互認，一方面通過兩地政府部門和專業團體的共商共議，豐富現時大灣區標準化發展的文件，更可起草跨境基建專章；另一方面也可考慮修訂《香港鐵路條例》，允許跨境段採用內地的鐵路工程建設標準，反之亦然，均以採用更高標準為原則。

## 加快區域協調發展節奏

北部都會區和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發展有時不我與之態勢，發展速度決定一切。現時，港深西部鐵路目標是在2034年至2038年落成，與其鄰近的新田科技城等創新科技地帶預計在2026年至2027年陸續推出用地，有數年的時間差。港深西部鐵路與北部都會區發展

時序耦合，是應有的原則，而爭取與產業活動協同發展則是應有的目標。解決方法是重新審視傳統基建審批流程，即通過科技應用和大數據的共享，將環評、城規、收地等個別程序壓縮，以及通過程序同時施行再壓縮整體用時，務求在不降低標準下以最短時間完成所有法定程序，從而帶來要素流通紅利、土地價值紅利和制度創新外溢紅利。

社會同時關注港深西部鐵路管運後通關查驗的機制創新，提出了「一地兩檢」等方案，背後就是通關效率所創造的效益或引起的損失問題。西九龍高鐵站等口岸實行「一地兩檢」，明顯較傳統的「兩地兩檢」更高效，過關旅客亦有更高的滿意度。然而面對過關人次不斷增加、區域人口流動成為不少大灣區民衆的生活日常，過關的效率有必要進一步提升。在高新科技的加持下，更有大膽創新的條件。

筆者建議兩地政府可選擇一至兩個口岸，如新皇崗口岸，試行「合作查檢，一次放行」和「無感通關」，將成功經驗套用於港深西部鐵路。「無感通關」應該是未來通關的大方向，港深西部鐵路乘客只需在始發站完成「預檢驗」，列車行駛中自動完成數據比對，抵達後便可直接通行。這需要在鐵路項目規劃同步嵌入物聯網射頻標識與生物特徵識別系統。此外香港要研究制定通關特別條例，為「預檢放行」模式提供法理依據；同時要制定跨境數據流通管理條例，明確生物特徵數據的存儲位置、保存期和共享權限等規則。

港深西部鐵路的真正價值，在於它作為「制度實驗室」的示範意義。當跨境協同機制突破屬地管轄慣例和建設時序擺脫行政壁壘束縛，所產生的制度創新紅利將遠超基建和運輸功能本身。在港深兩地以至粵港澳大灣區邁向全域同城化的進程中，該項目將能成為突破區域治理難題和制度創新的關鍵範例。

# 意圖染指格陵蘭 動搖美國西方盟主地位

鄧飛 立法會議員 教聯會副會長



美國副總統萬斯(JD Vance)的妻子烏莎(Usha Vance)將於3月27日隨美國代表團訪問格陵蘭島。據報道，代表團成員包括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沃爾茲(Mike Waltz)及能源部長賴特(Chris Wright)。訪問期間，兩人將前往當地的美國軍事基地。對於美國代表團的到訪，格陵蘭總理艾格德(Mute Egede)形容此舉「極具侵略性」，並質疑美國展示強權的意圖。

此事件反映了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爭奪格陵蘭島地緣政治優勢及當地資源時，完全不顧其北約軍事聯盟盟主的地位，亦不介意其他盟國有何觀感。特朗普的目標顯然超越了傳統盟主的角色，他更關注於實現「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願景，即使需要犧牲盟國利益或冒犯盟國，亦在所不惜，展現了他「唯我獨尊」的外交特色。

## 吃戰爭紅利 美搶佔「盟主」先機

二戰結束後，美國憑藉其雄厚的經濟與軍事實力，成為西歐各國的主導力量。二戰導致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崩潰，各國貨幣匯率波動劇烈，國際貿易受阻。當時，美國是唯一未受嚴重破壞的主要經濟體，憑藉其強大的工業產能，成為全球經濟復甦的核心推動者。

戰後美國經濟佔全球GDP約50%，美元成為國際貿易主要結算貨幣。美國持有全球大部分黃金，並擁有全球約三分之二的黃金儲備，具備兌換能力，為協助西歐重建經濟，馬歇爾計劃是美國的重要舉措，其核心目標在於向因戰爭而經濟瀕臨崩潰的西歐國家提供援助，協助其重建經濟，並抗衡蘇聯在歐洲的擴張。

與此同時，與馬歇爾計劃密切相關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則為戰後經濟秩序提供了穩定框架。1944年，44個國家代表在美國布雷頓森林會議上設計了這一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採用金本位制，以美元為核心貨幣，美

元與黃金掛鈎，其他貨幣則與美元掛鈎，從而建立了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其目標是避免重演1920-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和競爭性貨幣貶值，美元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結算貨幣，而美國承諾以每盎司黃金兌換35美元，其他貨幣則與美元掛鈎，即間接掛鈎黃金。

在軍事領域上，西方國家則通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實現了戰略聯盟，這可以視為馬歇爾計劃的軍事延伸。北約的成立與布雷頓森林體系及馬歇爾計劃共同構成了二戰後美國主導的西方政治、經濟與安全秩序。美國的經濟實力成為其團結西歐國家的核心力量，也是西方同盟得以維繫的基礎。可以說，西方同盟是由美國出錢出力支撐而來的。

## 背信棄義相互猜忌 聯盟生嫌隙

進入1960年代，西歐經濟逐漸恢復，德國、法國和日本的經濟實力趕上甚至超越美國。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開始下降，貿易優勢亦逐步減弱。1971年，外國央行持有的美元超過了美國的黃金儲備，法國等國要求兌換黃金。同年8月15日，尼克松總統宣布關閉黃金兌換窗口，停止美元與黃金的兌換，布雷頓森林體系實質上宣告崩潰。這是二戰後美國首次出現「力不從心」的情況，也令盟國對美國的信任受到打擊，認為美國沒有信守承諾，甚至感覺被美國出賣。今天我們看到特朗普霸權行徑凌駕盟友利益，其實只是延續當年貨幣匯率政策上的背信棄義而已。

冷戰結束後，隨著蘇聯解體，華沙公約組織瓦解，北約本應失去存在的必要性，但該組織卻持續運作。美國與北約成員國的矛盾也逐漸顯現。例如，在南斯拉夫內戰中，美國主張進行軍事干預，北約成員國對此態度不一，而美國憑藉自身的軍事優勢主導了決策，結果出兵，進一步加深了內部矛盾。此外，美國保守派對北約成員國在防務上「搭便車」的行為一直不滿。在北約總務開支佔全球軍費70%以上的背景下，成員國多次

未能達到GDP2%的國防支出目標，也加劇了這種不滿。

在美國國內，貿易赤字和聯邦赤字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一難題在克林頓時代曾經得到短暫紓緩，但反恐戰爭又讓赤字再度飆升。自新冠疫情以來，美國聯邦政府的赤字及債務水平急劇上升，美國財政部去年底公布數據指出，在9月為止的財年，聯邦財政赤字突破1.8兆美元，是除了新冠疫情時期以外歷史第三高，且在較高利率的背景下，美國聯邦債務利息首次超過1兆美元(約32.3億美元)。

特朗普以商人的視角看待國際事務，其「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議程優先於傳統盟主角色。從他意圖吞併格陵蘭島的行徑來判斷，他是用典型的企業管理思維來解決美國貿易赤字和聯邦赤字的問題：一方面在減輕負債的同時增加資產。謀取格陵蘭島的能源資源，實質上是希望為美國增加資產，平衡美國的「資產負債表」，這與其希望從烏克蘭獲取所謂5千億美元礦產資源的戰略如出一轍。由此可見，透過財金手段去解決美國赤字問題，是特朗普種種部署背後的大戰略。

然而，特朗普的策略也帶來了負面影響。一方面，西歐盟國對美國的信任進一步下降，全球資金流向出現變化，越來越多的投資者撤出美國市場，轉而投向中國和香港特區市場。另一方面，格陵蘭島作為一個重視自然環境的地區，對美國的大規模開採行為自然持強烈反對態度，並引發環保團體的抗議。此外，國際法亦未賦予美國吞併格陵蘭島的合法手段。

特朗普的政策反映了美國從二戰後以來的地緣政治與經濟演變軌跡。在全球極化加速的背景下，美國內部的保守派勢力更加傾向於以本國利益為優先，對傳統盟友的承諾則逐漸淡化。相較之下，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更強調合作共贏，未來或將在國際秩序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